

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一个基于 Pr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

程名望 史清华*

摘要: 本文运用 2003—2006 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个体特征和农户家庭特征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研究表明: 就个体特征来看, 男性、非农业户口和身体健康的农民外出就业的意愿更强, 而户主或家庭主要经营、拥有专业技术职称、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的农民更不愿外出务工; 就家庭特征来看, “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家庭经营主业”、“是否国家干部职工户”、“是否乡村干部户”、“是否党员户”、“是否军烈属户”和“是否五保户”等变量对农民外出务工影响显著, 而“家庭类型”则没有显著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所蕴含的启示是, 在制定促进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政策时, 要充分考虑转移者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因素, 特别是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 发挥农民自身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关键词: 个人特征 家庭特征 农村劳动力转移 Probit模型

一、问题的提出

2004—2010年, 连续 7 个“一号文件”的出台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标志着中央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而“三农”问题的本质是贫困问题, 对于传统行业, 贫困的根源在于较多的人口占有较少的资源和较低的全要素生产率 (TFP) 以及不合理的制度 (Lewis 1954)。这就决定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 那有什么希望” (徐勇、徐增阳, 2003)。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因和机制是十分复杂的。基于对转移动因及机制等方面的不同看法, 经济学对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可以分为三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 即结构主义方法、新古典主义方法和行为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是基于宏观视角的一种研究方法, 它以社会经济结构为分析的出发点, 强调社会经济结构刚性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结果施加给转移方的影响, 并认为对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只有从结构的角度入手才能做出正确的理解和评价。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以及乔根森模型是其典型代表。结构主义方法强调社会结构的失衡和制度的强制性与约束性对劳动力转移造成的影响, 有利于我们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认识劳动力转移的宏观经济动因和外在影响因素。但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和模型没有考察作为当事人的劳动者的决策过程, 因此, 这些模型的微观基础比较薄弱。新古典主义研究方法则弥补了这个缺陷和不足。新古典主义方法以经济行为个体为分析的基本单位, 强调个体利益最大化对转移决策及随之发生的转移行为的决定性作用, 其经典的研究是托达罗模型、哈里斯模型和斯达克的新劳动力转移经济理论。但新古典劳动力转移理论也有严重的局限性, 它假设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 劳动力的空间转移没有成本, 也没有其他障碍, 劳动力转移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 劳动力具有充分的信息等, 这些假设都是不切实际的。特别是新古典理论仍是一种总量分析, 没有考虑转移者个人及环境因素对其转移决策的影响。实际上的劳动力

* 程名望,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邮政编码: 200092 电子信箱: walkercheng@163.com 史清华,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 邮政编码: 200052 电子信箱: shq@sjtu.edu.cn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农民生产态度的假说与实证: 基于试验经济学的视角” (编号: 70673065)、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我国农民工进城务工风险管理问题研究” (编号: 200802471084)、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现代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和作用研究” (编号: EAA080254)、上海市社科规划青年课题“上海市农民工务工风险管理问题研究” (编号: 2008EJB007) 以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课题“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机理与长效机制研究” (编号: 10ZS30) 的资助,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建议。

区际转移要比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假设复杂得多,劳动力区际转移的研究需要引入更多的微观变量与非经济变量,如转移者个体特征、社会网络、政策和制度性变量等。对此做出进一步补充研究的,是行为主义研究方法。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强调劳动力区际转移是个体的决策行为,既突出了个体特征如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等对转移决策的制约,也引入了环境因素的影响,是通过研究劳动力转移的微观机制来解释劳动力区际转移的宏观模式。可以说,行为主义研究方法是对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和新古典主义研究方法的综合,也可以说,它是把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和新古典主义研究方法联系起来的桥梁。该研究方法通常是以实证检验的方法研究劳动者的性别、年龄、区域差异、婚姻等个性特征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一般是运用多项逻辑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或条件逻辑模型(Conditional Logit Model)来模拟劳动力的区际转移。这些逻辑模型优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首先它们是建立在经济理论基础上的统计模型,更重要的是逻辑模型可以同时引入区域性变量和转移者个体特征,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户口登记状况等。

对于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国内的研究主要是运用一般性统计分析的模式,研究性别、年龄以及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学特征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例如,赵耀辉(1999)认为正规教育对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很小,但对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有显著的影响;程名望、史清华和杨剑侠(2006)的研究证实了该结论。朱农(2002)发现教育仅仅对男性的转移决策有正的影响,对女性则没有。赵耀辉(1997)指出女性的转移概率比男性低7%,朱农(2002)发现婚姻状况对转移概率有显著的负影响。赵耀辉(1997)发现,年龄对转移决策有正的影响。史清华、卓建伟和郑龙真(2005)认为,“在面对市场经济风险中,男性敢于挑战风险的能力和勇气显著高于女性”。史清华和程名望(2005)通过对进城农民工进城障碍的分析,得出了“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农民工在进城动因上也存在差异”的结论。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运用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利用2003-2006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建立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个体特征以及农户的家庭特征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考虑了农户的家庭特征变量,并运用了更具代表性的全国性的数据,研究结果将更加深入和全面。

二、数据来源与特征

(一)资料来源背景

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的形成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根据中办发[1984]37号文件部署,在1984年冬至1985年春中央政府动员了一大批学者在全国272个村庄和部分县乡进行了一次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调查完成后,在一些学者的动议下,中央政府经过慎重考虑,于1986年底同意将这批被调查村庄设为固定观察点,进行长期观察。在二十多年的观察中,观察村与户样本规模与调查指标均有一定的调整。其中,大的调整共两次,一次发生于1993年,另一次发生于2003年。经调整后,目前全国共跟踪观察村庄335个,跟踪观察农户21000户左右。本文运用的是2003-2006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共有调查样本320774个。在对数据进行处理时,考虑到本文分析的对象是劳动力,所以剔除了16岁以下(不含16岁)、65岁以上(不含65岁)和在校学生¹三部分样本,然后选取面板数据(Panel Data)一共247349个。对于家庭样本,运用同样的方法,选取面板数据共81074个。

(二)样本资料的基本特征

样本资料的基本特征见表1。在统计分析中,主要运用了二元变量的处理方法,例如,对于“性别”,“男”赋值为1,“女”赋值为2;同样的,“是农业户口”、“有专业技术职称”、“受过职业教育或培训”、“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健康状况良好”、“是家庭主要经营者”、“是国家干部职工户”、“是乡村干部户”、“是党员户”、“是军烈属户”、“是五保户”、“是少数民族户”、“是信教户”赋值为1,其余赋值为2。“职业”、“从事主要行业”、“家庭类型”^④、“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和“家庭经营主业”则采用国家固定观察点的设置类型,

¹ 对于没有注明年龄或是否学生的样本,即这两项问题没有填写的样本,本部分也没有纳入分析范围。

^④ 在调查问卷中,一共设计了4种家庭类型,其中核心家庭是指在一个家庭中只存在一对姻缘关系,也即由一对夫妇或一对夫妇与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直系家庭是指在一个家庭中存在两对及以上姻缘关系,且这些姻缘关系之间是异代之间的关系,同代之间不存在妯娌或连襟关系,也就是说在这类家庭中,可以有二代、三代以至多代存在;扩展家庭是指在一个家庭中存在两对及以上的姻缘关系,且这些姻缘关系在同代间存在妯娌或连襟关系,也即至少有两对姻缘关系之间不存在任何亲子关系;不完全家庭是指不存在完整夫妻关系的家庭,即夫妻双方离异或一方丧偶,由单方与子女生活。根据古德的研究,全世界的家庭类型正在朝着核心家庭的方向发展,而这是和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全世界的社会现代化密切相关的(史清华等,2005)。

并和国家固定观察点的数据录入赋值相一致。具体来说,“职业”赋值:“家庭经营农业劳动者”赋值为 1,“家庭经营非农业劳动者”赋值为 2,“受雇劳动者”赋值为 3,“个体合伙工商劳动经营者”赋值为 4,“私营企业经营者”赋值为 5,“家庭乡村及国家干部”赋值为 6,“教育科技医疗卫生和文化艺术工作者”赋值为 7,“其他”赋值为 8,“从事主要行业”赋值:“农业”赋值为 1,“工业”赋值为 2,“建筑业”赋值为 3,“运输业”赋值为 4,“商业饮食服务业”赋值为 5,“其他”赋值为 6,“家庭类型”赋值:“核心家庭”赋值为 1,“直系家庭”赋值为 2,“扩展家庭”赋值为 3,“不完全家庭”赋值为 4,“其他”赋值为 5,“收入主要来源”赋值:“家庭经营为主”赋值为 1,“私营企业经营为主”赋值为 2,“受雇劳动者为主”赋值为 3,“受雇经营者为主”赋值为 4,“国家干部职工、乡村干部工资为主”赋值为 5,“其他”赋值为 6,“家庭经营主业”赋值:“种植业”赋值为 1,“林业”赋值为 2,“畜牧业”赋值为 3,“渔业”赋值为 4,“工业”赋值为 5,“建筑业”赋值为 6,“运输业”赋值为 7,“商业、饮食、服务业”赋值为 8,“其他”赋值为 9。

表 1 农村固定观察点个人特征与家庭特征的统计分析

		均值	标准差	峰度	偏度
个人特征变量	性别	1.48	0.50	-1.99	0.066
	年龄(岁)	39.46	13.56	-1.18	0.02
	是否农业户口	1.04	0.22	19.35	4.19
	受教育时间(年)	6.65	4.87	5.55770	54.08
	有专业技术职称	1.89	0.40	12.99	-3.67
	受过职业教育或培训	1.86	0.42	9.87	-3.23
	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	1.88	0.40	12.79	-3.66
	健康状况	1.37	0.81	2.34	1.44
	是否家庭主要经营者	1.35	0.53	-0.93	0.53
	职业	2.14	2.05	2.53	1.83
	从事主要行业	2.22	1.96	-0.54	1.03
	外出从业时间(日/年)	69.85	120.43	0.19	1.37
	样本数		247 349		
家庭特征变量	家庭类型	1.38	0.76	5.76	2.33
	家庭收入主要来源	1.73	1.41	2.49	1.85
	家庭经营主业	2.08	2.43	1.98	1.86
	是否国家干部职工户	1.93	0.28	20.75	-4.39
	是否乡村干部户	1.94	0.27	23.62	-4.71
	是否党员户	1.83	0.39	3.39	-2.11
	是否军烈属户	1.97	0.22	52.06	-6.97
	是否五保户	1.98	0.17	122.33	-11.03
	是否少数民族户	1.88	0.35	7.71	-2.85
	是否信教户	1.93	0.30	19.88	-4.35
样本数		81 074			

注:本表数据所用分析软件是 SPSS11.5。

资料来源: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

三、研究方法与变量设置

(一)研究方法

考虑到有些变量赋值为 0 不适合应用 Logit 模型,因此本研究采用 Probit 模型的估计方法。Probit 模型是计量经济学非线性分析中的重要模型之一,常被应用于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朱农,2002;都阳等,2003;刘靖,2008)。根据观察点的数据,劳动力有两种决策:转移 ($M = 1$) 和不转移 ($M = 0$)。而影响转移决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例如:转移者的性别、年龄、文化水平、家庭特征等,所以我们用一组向量 X 来解释转移决策的形成。运用 Probit 模型,有:

$$\lim_{\beta'X_i \rightarrow +\infty} \text{Prob}(M = 1) = 1$$

$$\lim_{\beta'X_i \rightarrow -\infty} \text{Prob}(M = 1) = 0$$

其中, β 为待估参数。由于该模型使用的连续概率分布函数为正态分布函数,所以有:

$$\text{Prob}(M = 1) = \int_{-\infty}^{\beta'X_i} \phi(z) dz = \Phi(\beta'X_i)$$

在具体的计量分析过程中,根据需要,又采用了如下的一些处理方法:(1)由于来自同一家庭或同一村庄的劳动力,其经济行为、经济决策往往会相互影响,带有一定的相关性,即组内数据不独立,本文采用聚类

稳健回归 (*Clustered Robust*) 方法以解决此问题。(2) 由于 2003-2006 年的样本数目较大, 处理起来比较困难, 为了更有效地分析和处理数据, 笔者结合运用了 *Access*, *Excel*, *Spss* 和 *Eviews* 四种应用软件, *Access* 主要用于个人数据和家庭户数据的连接和对应, *Excel* 主要用于读取 *Access* 数据库并进行整理和计算, *Spss* 主要用于数据的统计特征分析, *Eviews* 主要用于计量分析。

(二) 变量设置

被解释变量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率。对于转移劳动力的设定, 我们采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定义, 即“一年内离家外出务工 6 个月以上的劳动力为转移劳动力”, 把外出务工 6 个月以上的数据赋值为“1”, 其余赋值为“0”。解释变量的设置是根据调查数据的特征, 选择个人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两部分。其中, 个人特征变量包括“与户主关系”、“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是否农业户口”、“是否有专业技术职称”、“是否受过职业教育或培训”、“是否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自我认定的健康状况”、“是否家庭主要经营”、“职业”、“从事主要行业”等, 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类型”、“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家庭经营主业”、“是否国家干部职工户”、“是否乡村干部户”、“是否党员户”、“是否军烈属户”、“是否五保户”、“是否少数民族户”、“是否信教户”等。

四、回归结果及分析

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 2。

表 2 转移决策的 Probit 模型估计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农民外出务工时间是否大于 6 个月 (是 = 1; 不是 = 0)	
		Coefficient	z-Statistic
个人特征变量	与户主关系	0.0899**	15.4444
	性别	-0.3791**	-37.5496
	年龄	-0.0264**	-56.6898
	文化程度	0.0076**	9.8369
	是否农业户口	0.1631**	8.2134
	是否有专业技术职称	0.1073**	4.9180
	是否受过职业教育或培训	-0.1402**	-7.0247
	是否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	0.2964**	16.9684
	自我认定的健康状况	-0.1099**	-14.9601
	是否家庭主要经营	0.0604**	6.1747
	职业	0.0504**	17.7605
从事主要行业	0.2075**	69.3183	
家庭特征变量	家庭类型	0.0105	1.6230
	家庭收入主要来源	0.1184**	33.1504
	家庭经营主业	-0.0413**	-21.5489
	是否国家干部职工户	0.2928**	13.5252
	是否乡村干部户	0.2635**	11.1803
	是否党员户	0.1032**	7.0172
	是否军烈属户	-0.1340**	-4.2453
	是否五保户	-0.7133**	-15.3457
	是否少数民族户	0.1594**	9.7833
是否信教户	0.1201**	6.4664	
Log likelihood		-45.48932	
McFadden R-squared		0.3527	
Total Obs		247349	

说明: (1) legend * 表示 $p < 0.10$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2) 本表所用分析软件是 Eviews3.1

(1) “与户主关系”和“是否家庭主要经营”的系数显著为正, 这表明不是户主或家庭主要经营者的农民外出就业的动机更强。户主或家庭主要经营一般是农户的顶梁柱, 他们需要留在家中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并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 很难常年外出务工。

(2) “性别”的系数显著为负, 这表明与女性相比, 男性外出就业的倾向性更强一些。该结论与已有研究是一致的(赵耀辉, 2001; 蔡昉等 2002; 朱农, 2005)。“年龄”的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年纪越大, 农民外出务工的倾向性越弱, 该结论与赵耀辉(2001)、蔡昉等(2002)、朱农(2005)等的研究并不完全一致, 他们所得的回归系数都是显著为正的, 但他们又设置了年龄平方这一变量, 得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文化程度”的系数显著为正, 这显示了教育对劳动力转移的重要作用。加强农村教育, 是解决我国剩余劳动力的长久之计。

(3)“是否农业户口”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非农业户口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起显著的正向作用,即非农业户口利于劳动力转移。因此,必须尽快改革户籍制度,给予农民同等的制度身份,才能真正从制度上保证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也进一步推进工业化进程。由于历史原因,户籍制度实质上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它对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的深化和城乡壁垒的形成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改革户籍制度,就是要实行一系列的制度改革,给予农民工以城市市民待遇,不仅在工资待遇和就业上与市民一视同仁,而且要在福利保障、子女就学等方面给予同等待遇。¹在多年“农村支持城市”的政策背景下,中国农民已经为中国经济的发展牺牲了太多^④,没有任何理由再让农民做出牺牲。农民是占多数的,但农民又是弱勢的,他们并没有太多的话语权。^(四)享有话语权的人往往在城市,而城市利益就是他们的利益,所以,打破某种集团式利益部门的利益,才能真正制定出农民可以享受的较公平的制度。⁴

(4)“是否有专业技术职称”和“是否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这表明拥有专业技术职称或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的农民更不愿外出务工。这是因为他们在农业经营上有技术优势或经验优势,所以更愿意依附于农业。这正如史清华(2006)得出的结论:“农户营地规模呈现一种典型的两极化分布,这一变化预示着土地有一种向种田能手集中的趋势”。而“是否受过职业教育或培训”的系数显著为负,则说明职业教育或培训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职业教育或培训多是非农型技术教育或培训,例如电子组装、电焊工、裁剪等,其教育或培训导向就是城镇务工,所以接受了职业教育或培训后的农民,有了一技之长,既有了进城务工的信心,也确实有了更多的在城务工的机会。

(5)“自我认定的健康状况”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越是身体健康的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倾向性越强。健康是劳动力转移的一个必要条件,加强和改善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将有利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目前,国家给予卫生事业的财政支持每年都有提高,但卫生事业费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基本维持在1%以下,其中分配给农村的经费更少。“职业”和“从事主要行业”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职业和从事的主要行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显著的影响,职业或行业的非农特征越强,农民外出务工倾向性就越强。

(6)“家庭类型”的系数并不显著,这表明家庭类型对农民外出务工没有显著的影响。“家庭收入主要来源”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这表明越是以非家庭经营为主的农民,其外出就业的倾向性就越强。“家庭经营主业”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家庭经营主业的类型对劳动力转移有显著的影响,家庭经营主业的非农化倾向越强,农民外出务工的倾向性越弱。

(7)“是否国家干部职工户”、“是否乡村干部户”和“是否党员户”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国家干部户和党员户外出务工的倾向性比较弱,这是因为干部户和党员户一般是农村的富裕户,属于农村的成功人士或令人羡慕的家庭,按照相对经济地位下降理论,这样的农户显然是不愿外出务工的。“是否军烈属户”、“是否五保户”表现出了同样的计量经济学特征,这表明军烈属户和五保户外出就业的倾向性更强。这一点似乎难以解释,因为军烈属户和五保户一般并没有青壮年劳动力,并不具备外出就业的条件。但按照相对经济地位下降理论,军烈属户和五保户一般都是低收入户,相对贫困度很高,所以其外出就业的意愿就越强。愿意外出却没有条件外出,其痛苦可想而知。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对军烈属户和五保户的抚恤或保障力度,使得他们的处境得以改善。“是否少数民族户”和“是否信教户”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这表明少数民族户和信教户外出就业的倾向性较弱。少数民族户和信教户不愿外出就业,应该是与其文化适应性有关系,少数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使他们不愿意到一个难以融合的新文化环境中去。而这种倾向可能会使得少数民族地区

¹“人人平等”、“农民和市民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和尊严”是宪法基本理念,在持续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一直给予农民歧视性的待遇和地位。

^④建国初期,我国国民经济基础极为薄弱,国家要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只有通过资源的政策性倾斜,推进工业化进程。资源的政策性倾斜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政府通过建立集体化农业制度,采取粮食的统购统销、工农产品剪刀差等方式,为城市工业化积累资本。政府长期实行过度提取农业剩余的制度,农业经济受到严重削弱,使得农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从而出现了城乡分离、工农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在这个过程中,农民无疑做出了历史性的牺牲。

^(四)韦伟(2005)用一个很好的“数量悖论”的博弈论模型证明了这一点,并给出了很好的解释。

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改;同样,某些法律或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道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地位开放原则是不允许有任何限制的。”(参见约翰·博德利·罗尔斯,1988《正义论》,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页)

(户)和信教地区(户)愈加贫困。该部分的分析表明农户家庭的社会地位是影响农民外出务工和在农村非农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而也印证了史清华和徐翠萍(2007)的研究结论,农户家庭的社会地位是农户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加剧的一个重要根源。

五、结论性评述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朱晓东,2007;华民,2008)。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农民工歇业、失业和返乡现象比较突出。而2010年初,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却又出现严重的“民工荒”。农村劳动力转移出现如此频繁和大幅度的波动,无论是“民工潮”,还是“民工荒”,无论是“招工难”,还是“找工难”,都给经济发展或社会稳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还会影响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就转移机制而言,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既有社会因素,也有转移者个人因素。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农民工是理性的,是否转移的根本影响因素在于转移者个人的决策。本文的研究表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都是影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制定促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转移者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等微观因素,特别是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相信农民的智慧 and 理性,发挥农民自身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具体来说,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上,政府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一方面充分发挥农民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要恰当行使自己的职能,既不能不管不问,更不能再强行干预或政府主导。首先,必须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¹其次,要改革户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消除对农民工的一系列制度歧视。再次,要大力发展城镇经济,改善农民城镇就业环境。最后,要加强农村教育和卫生投入,增强农民工总体素质。总之,各地政府必须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在逐步取消户籍制度等障碍因素的同时,以农村劳动力开发、配置、利用、流动为目标,以提高劳动者整体素质为基础,营造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软、硬件环境,特别是要加强农村的交通通讯设施建设、建立规范的专业化务工信息中介机构、拓展多渠道的进城务工途径、加强劳动力转移相关法规或保障体系建设等。

参考文献:

1. 蔡昉、都阳,2002《迁移的双重动因及其政策含义——检验相对贫困假说》,《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2. 程名望、史清华,2005《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因:从推到拉的嬗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6期。
3. 程名望、史清华、杨剑侠,2006《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因与障碍的一种解释》,《经济研究》第4期。
4. 都阳、朴之水,2003《迁移与减贫——来自农户调查的经验证据》,《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5. 华民,2008《对外开放造就中国经济奇迹》,载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六届学术年会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1-28页。
6. 刘靖,2008《非农就业、母亲照料与儿童健康——来自中国乡村的证据》,《经济研究》第9期。
7. 史清华、徐翠萍,2007《农户家庭成员职业选择及影响因素分析——来自长三角15村的调查》,《管理世界》第7期。
8. 史清华、卓建伟、郑龙真,2005《农民外出就业及遭遇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10期。
9. 韦伟,2005《城乡差距、数量悖论与政策偏回》,《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4期。
10. 徐勇、徐增阳,2003《流动中的乡村治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页。
11. 赵耀辉,1997《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经济研究》第2期。
12. 朱农,2002《论收入差距对中国城乡迁移决策的影响》,《人口与经济》第5期。
13. 朱晓东,2007《高级宏观经济学讲义》,上海交通大学,第121页。
14. Fei C. H., and G. Ranis 1961.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 (4): 533- 565
15. Jorgenson Dale W., 1967. "Surplus Agricultural Labor and Development of Dual Economy"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 (3): 192- 202
16. Harris J R., and M. P. Todaro. 1970 "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A Two-Sector Analy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0(3): 324- 347.
17. Chenery, H. B. 1975. "The Structuralist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5(2): 310- 315
18. Lewis W. A.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22(5): 139- 191.
19. Stark, O., and J. E. Taylor 1991 "Migration Incentives, Migration Types: The Rol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 Economic Journal*, 101(4): 234- 254
20. Todaro, M. P. A. 1969. "Model of Labou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3(1): 138- 148

¹ 实际上,中央政府已经注意到了该问题。2003年1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3]1号)。文件开篇就谈到:“农民进城务工就业仍然受到一些不合理限制,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拖欠克扣工资、乱收费等现象严重。同时,农民进城务工就业使社会治安、城市管理等工作面临新的问题”。

Individual Features,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and Rural Surplus Labor Migr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Probit Model

Cheng Mingwang¹ and Shi Qinghua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ongji University;

2: School of Antai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stable survey in countryside over the period of 2003 and 2006, the paper establishes econometric model to analyze how farmers' individual features and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affect rural surplus labor migration. The research based on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shows that male, non-agricultural households and healthy farmers have more willing to migration, but the head of the household or farmers family major operators with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titles or received training in agricultural techniques farmers have weak willing to migration. The research based on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shows that "the main source of household income", "family-run core business", "whether the state cadres and employees households", "whether the village cadres families", "whether the communist members", "whether the revolutionary martyrs families" and "whether the five guarantees"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to migrant farmers, but "Family type"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From what has been concluded in this paper, it can be found that individual features and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fully considered whe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surplus labor policy, in particular to respect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peasants and the role of farmers' own creativity and enthusiasm.

Key Words Individual Features;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Probit Model

JEL Classification J43; R23

(责任编辑:彭爽)

(上接第 41 页)

12. Campa Jose M., and Linda S. Goldberg. 1997. "The Evolving External Orientation of Manufacturing." *Federal Reserve Bank New York Economic Policy Review*, Issue July: 53-81.
13. Hummel D., D. Rapoport and K. - M. Yi. 2001. "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4(1): 75-96.
14. Grossman, Gene M., and Elhanan Helpman. 2002. "Outsourcing in Global Economy." NBER Working Paper 8728.
15. Liza Jabbour, and Jean-Louis Mucchielli. 2004. "Technology Transfer through Backward Linkages: The Case of the Spanis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ahier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Economiques*, bla04073, Universit Panth on-Sorbonne (Paris 1).
16. Krugman Paul. 1980.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0(5): 950-959.
17. Vernon, R. 1966.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0(May): 190-207.
18. Young A. 2002. "The Razor's Edge: 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4): 1091-1135.
19. Zwanuller J., and J.K. Brunner. 2005. "Innovation and Growth with Rich and Poor Consumers." *Metronomica*, 56(2): 233-262.

Global Value Chain, Market Size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Chines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e

Sun Jun¹ and Liang Dongli²

(1: Business School Hua 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 Business School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How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chieve industrial upgrade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has been a research focus over the last 20 years. The paper adopts the heterogeneous enterprise model to analyze this issue. We find that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be achieved not only by "learning by doing", but also by the original innovation driven by internal market demand, thus real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learning by doing effect" to "home market effe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specific function of each parameter in the changing process, and finds that the rising wag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ake enterpris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re-outsource those intermediate products, which could decrease "learning by doing effect" and induce technical innovation by enterpris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hile the rising international and internal trade cost will keep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dustry in low end. Our analysis also points out the right directions for China's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Key Words Global Value Chain; Market Size; Industrial Upgrade

JEL Classification F41; L16

(责任编辑:陈永清)